

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文献综述

李吉和,常 岚

(中南民族大学 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从目前学术界研究情况看,对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与融入程度研究有所进展。穆斯林流动人口已经逐步适应城市社会,但要融入城市还面临诸多困难,主要障碍除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户籍制度限制他们不能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外,其就业方式单一、文化程度低、语言文化差异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研究方法单一、一般性研究多、对从业特征明显群体调查研究多、定性研究多等问题。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从事不同行业的、不同的穆斯林民族都要进行研究,逐步构建穆斯林流动人口融入程度指标体系,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以便更深入、更全面地开展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

关键词:穆斯林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与融入;研究综述;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1-0033-0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媒介日益发达,陆路交通条件快速改善,国人传统的安土重迁思想观念逐渐改变,再加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人口在全国各地流动已成常态。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36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7%^[1]。在全国流动人口大军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聚集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5%。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等原因,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从人口流动的规律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地区的人口必然向发达地区汇聚,乡村人口必然向城市流动。因此,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为了谋生与发展,或凭借自身人力资本,或靠自己的一技之长,通过不同渠道,纷纷进入中、东部地区大中城市。根据监测,2012年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全国2.36亿流动人口的5.4%,达1260万^[1]。

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重要构成部分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向中、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明显。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10个信仰伊斯兰

教民族人口的数量为231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74%,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0.34%。其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主要有回族(1058万)、维吾尔族(1007万)、哈萨克族(146万),其他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从数千到数十万人不等。有多少穆斯林人口外出从业谋生,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和流动的季节性,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7%推测,穆斯林流动人口应该不会低于穆斯林总人数的10%。也就是说,在250-300万之间。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长,对城市相关的服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特别是来自西部地区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在文化、习俗、语言、宗教信仰、从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特殊性,在流入地的就业与生活往往处于劣势,适应并融入当地城市社会面临更多困难,往往容易发生矛盾甚至冲突。据有关部门统计,近些年来,全国出现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80%以上发生在散居地区特别是城市,而这80%中许多与穆斯林流动人口有关。有的纠纷事件影响很大,如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发生的个别新疆流动人员强买“切糕”事件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尤其是穆斯林流动人口

收稿日期: 2013-10-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中、东部地区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研究”(12BMZ07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中、东部地区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问题研究”(11YJA85008);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持续资助项目“武汉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基于对‘兰州拉面馆’群体的调查”(2013ycxzz13)。

作者简介: 李吉和,男,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城市民族问题。

进入城市,如何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城市社会采取什么政策措施应对,成为政府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并用不同方法、从不同层面对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与融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关于“融入”内涵的研究

对流动人口融入进行研究,首先涉及到“融入”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研究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对“融入”的理解也有差异。西方学界对“融入”或融合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外国移民群体和弱势群体,尤其是族群关系问题。而将社会融合作为一个社会政策是基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法国学者维莱·勒内于1974年首先明确提出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目的在于阐述被排斥在就业岗位正式来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状态^[2]。社会政策是反社会排斥、实现公民权利、促进社会融合的有力手段。在欧洲发源并兴起的社会排斥理论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发展。

随着对社会排斥研究的深入和反社会排斥计划及行动的实践,西方学者和政府都热衷于使用社会融合这个概念。因为反社会排斥就是要确保任何人都能享受到居住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现代社会,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强大且有凝聚力的社区,这就是社会融合,社会融合逐渐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政策实践的核心概念^[3]。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社会融入是指“通过缩小差距,降低最弱势社区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并确保支持能够传递到最需要的群体。社会融入意味着增进被排斥群体、个人的社会参与机会,无论在工作、教育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4]。此概念强调缩小移民差距、为移民增权和鼓励移民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此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将社会融入作为人类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较高的社会融入水平已成为人类社会发所追求的目标之一^[5]。

国内学者在研究流动人口融入问题时,有称为融合的,如任远、邬民乐认为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6];马西恒、童星强调社会融合是指“新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等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7],着重强调新移民对城市社会的适应以及市民化过程。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常使用“社会融入”这个概念,强调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并能够获取当地社会资源,享受到城市基本公共均等化服务。如张广济认为“社会融入是指特殊情境下

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8]有的认为,社会融入是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与群体通过结构调整与主体自我适应,能够享有就业、社会服务、城市文化生活、政治选举等方面的广泛的社会权利与平等参与的机会,逐步融入主流社会^[9]。在学界,有的用融合,有的用融入,二者是否等同,能否混用,有无区别,作为严谨的科学研究必须有明确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融合与融入是有区别的,“融合”是双向的,表示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融汇到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意的文化体系;相反,“融入”是单向的,指流动人口在经济、行为、文化和观念上都融入到了流入地的主流社会体系中。融合是不同文化之间接触的最终目标,而融入则是融合的第一步。根据中国流动人口的特点,“融入”比“融合”更好地体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过程及其对流入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10]。用融合概念的学者,更多借用的是西方概念,而西方学者用此概念既强调种族间的关系,更强调外来移民文化接受移入国家民族文化,如美国20世纪推行的“熔炉”政策。说起融合往往使人想起同化政策,很容易产生歧义,同化是被动的,而融入主动性更多一些。因此,笔者倾向于使用“融入”这个概念,主张慎用“融合”为好,尤其是在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时。

二、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状况

欧盟于2004年提出了欧洲公民资格和融合指数(European Civic Citizenship and Inclusion Index),用来监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该指数包含劳动力市场融合、长期居住、家庭团聚、入籍和反歧视五个方面共99个指标。2007年被修改为移民整合指数(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 Index),不仅将政治参与纳入了移民整合指数,还将移民整合指标增加到140个政策指标^[11]。

针对我国流动人口融入境况,学界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城市融入的层次和内涵,普遍认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少学者在调查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具体指标,以便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进行量化分析。风笑天从经济、心理、环境、生活等4个维度,用9个指标测量了三峡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状况^[12];杨黎源从邻里关系、工友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风俗习惯、联姻结亲、安全感、定居选择等8个视角分析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13]; 张文宏、雷开春借鉴国外移民研究的经验, 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 利用 14 个主观和客观指标考察了上海地区的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结构, 包括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念的程度、职业稳定程度、亲属相伴人数、本地户籍状况、本地人身份认同程度、社会交往范围、社会心理距离、日常交往人数、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住房满意度、添置房产意愿^[14]。此外, 还有更多的学者构建了测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指标体系, 如杨菊华的社会融入指标体系由 4 个维度(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同)、16 个指标和具体变量构成, 并通过对社会融入指标的分析, 可以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结果提炼成隔离型、多元型、融入型、选择型、融合型五种模式^[15];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2》课题组构建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指标体系框架, 用 6 个维度(劳动就业、权益保障、子女教育、社区接纳、身份融合、融合项目)、14 个政策指标反映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的总体状况^[16]。

近年来, 学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适应及融入问题主要从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维度进行研究, 成果丰硕。李林凤研究了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市民社会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间相互接纳、认同的程度等^[17]; 李伟梁关注了经济、社会、心理三个方面^[18]; 马旭侧重于生活层面、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19]; 任霞从经济适合、社会接纳、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四个维度建立大城市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社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融合状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进而评价了目前上海市外来少数民族社会融合程度^[20]; 张红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心理四个层面对朝鲜族在烟台市的适应与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21]; 高向东等采用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认同、心理归属四个维度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 认为上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程度已达到中等以上水平, 并且适应的各维度差异性较大, 以文化认同维度最高, 心理归属维度最低^[22]; 高翔、宋相奎从城市环境适应、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及文化心理适应对银川市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进行了系统探讨^[23]; 汪永臻从就业类别、就业途径、经济收入、城市居住、城市消费五个方面对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经济融入进行了研究^[24]; 张继焦在其著作中从城市迁移者刚进城时的感受、经济生活、生活方式、语言使用、社会交

往、恋爱婚姻六个方面, 系统地展示了少数民族城市适应的总体状况^[25]。

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指标体系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大多借用全国流动人口指标体系, 通过对广州、兰州、银川、南京、厦门等城市的调查, 对城市外来穆斯林流动人口适应与融入状况进行了探讨。陈晓毅对广州流动穆斯林的调查表明, 流动穆斯林在经济方面, 大多数收入微薄, 经济地位低下; 在制度(社会)层面上适应状况总体而言比较好, 但存在突发事件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穆汉关系等问题; 在精神(宗教)层面上, 主要体现在清真寺和礼拜点相对不足、回民墓地紧缺^[26]。高翔、程慧波等在对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主要分布地区调研、信息采集的基础上, 分别采用萨默斯 d_y 系数分析、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等, 从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文化、日常生活方式)、心理等方面的适应程度进行系列评判, 认为在环境适应方面的城市气候、水土条件适应方面, 流动穆斯林来源地同兰州市的距离和他们的城市适应性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 而在交通状况和娱乐设施适应方面, 其相关性不明显; 在经济适应方面, 流动穆斯林的经济收入和适应性呈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 在社会适应方面, 宗教文化生活在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的日常生活方式开始逐渐适应; 在心理适应方面, 流动穆斯林在“自我”认识上表现了较为明显的适应性, 但在“认同”和“城市归属感”方面则呈现出了较强的不适应^[27]。高翔等^[28]及张燕^[29]通过因子分析将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归纳为“城市归属”、“身份判断”、“自我认同”三个因子, 认为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综合水平很低, “自我认同”因子最低, “城市归属”次之, “身份判断”最高。李晓雨、白友涛以南京、西安两个城市的流动穆斯林为样本, 对其经济生活、社会日常生活、宗教文化生活以及心理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认为不同城市中的流动穆斯林由于群体自身不同的人口特征、穆斯林社区的变化以及城市文化特点的差异, 使他们在经济生活适应、城市日常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等方面有着不同特点^[30]。白友涛等在其著作中也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宗教生活三个方面对流动穆斯林人口的社会适应基本状况进行了描述^[31]。杨殷迪以广州市回族新移民为调查对象, 通过他们的经济状况、社会交往和文化适应探讨了回族新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32]。龚坚以群体适应为分析视角,

对厦门外来穆斯林的城市适应状况进行了分析^[33]。此外,周传斌、杨文笔以回族为例,对城市流动少数民族宗教生活及宗教适应机制进行了探讨^[34]。

不少学者也关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适应与融入问题。维吾尔族在穆斯林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上仅次于回族,但由于大多数维吾尔族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交流问题,加上文化教育程度比较低,社会适应程度更低,融入当地社会困难重重。帕提古丽从语言差异、社会关系、生活习俗的适应、城市制度的缺失、族际交往与族际关系、与本地人的关系等方面,对兰州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进行了分析^[35]。阿不都艾尼认为,在北京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问题表现为在文化上存在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差异;社会交往上主要表现为单一的人际关系网络;经济层面主要是就业层次低、同质性强、利润薄;心理层面是社会排斥与歧视带来的心理伤害^[36]。徐平等通过对乌鲁木齐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调查,认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存在经济、职业、文化、制度和心理的多维排斥,使其融入城市社区面临许多困难,其中经济收入偏低是适应融入的基本问题,而制度和心理上的融入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37]。

穆斯林流动人口由于其特殊的宗教信仰,进入城市后其宗教活动也将发生一些变化,其宗教生活如何适应城市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陈晓毅在研究都市流动穆斯林文化适应时发现,进入城市的穆斯林在宗教适应上出现宗教活动频率放慢、宗教要求降低、宗教责任感减弱的现象,并且会遇到饮食不清真、礼拜点相对不足、回民墓地紧缺等问题^[26]。白友涛等认为,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中存在着生产经营困难、经济地位不高、突发事件较多、社会资本不足、宗教生活困难、未能参与管理等问题^[31]。周传斌、杨文笔认为,宗教设施的缺乏成为流动穆斯林群体进入城市后必然面对的难题,造成了流动穆斯林群体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流动穆斯林群体的流动属性使得他们缺乏对特定寺坊社区的归属和认同,频繁的流动和散居肢解了统一社区中穆斯林群体间的联系和互动,使得不少穆斯林个体产生情感压抑或精神彷徨,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34]。

三、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障碍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视角进行了研究。

众多学者从社会排斥视角研究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制度上的限制和排斥,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其中户籍制度尤为众人所指。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排斥,限制了流动人口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路径。农民工不能取得城市的户籍,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城市所接纳,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也受到了排斥。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不仅在制度上对农民工造成了隔离和排斥,还引发了城市市民在心理和行动上对农民工的排斥。农民理性地选择外出打工,但是由于社会排斥的巨大作用,使得农民工很难适应城市社会,无法融入城市社区,最终只能返乡或在城市艰难爬坡^[38]。此外,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对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生存、生活和发展具有显著影响^[6]。

更多学者从制度、经济、文化以及农民工自身因素等综合方面剖析制约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因素。有的认为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是制度障碍、经济障碍、公民素质^[39]。从经济层面看,就业不稳定、工资收入低,是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并在城市立足的首要因素;从社会层面看,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影响了两大群体之间的正常社会交往,构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又一障碍;从心理文化层面看,心理适应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40]。

影响穆斯林流动人口的障碍因素,众多学者立足各地调查,根据穆斯林不同民族特点,采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各个维度进行系统的分析,特别强调民族和宗教因素对融入的限制。高翔、鱼腾飞等运用结构变迁理论,针对流动穆斯林的特点,主要从民族因素(民族意识、民族宗教风俗、民族文化价值)、自身因素(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社会支持、族缘关系、社会关系)和制度因素(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方面系统分析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认为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是一个双向的适应过程,同时影响其城市适应的因素是多元的、复杂的^[41]。年龄对流动穆斯林的自我认同、城市归宿和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明显的影响,其影响作用呈现波动的现象;文化程度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身份特征决定不同文化融入群体与当地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决定其不同的文化认知和适应范式;家庭月收入对自我认同和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影

响,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族因素及文化认同深层次地影响着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28]。陈晓毅认为对广州流动穆斯林影响较大的因素中,经济因素排在第一位,宗教因素排在第二位,第三位为社会因素^[26]。张燕通过逐步回归模型分析,认为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性适应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分别是“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年龄”,而“职业”、“居住环境”和“与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在深层次上影响着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水平^[29]。杨殷迪认为影响回民社会融入的因素有制度政策、城市包容和民族风俗等客观因素以及经济条件、职业类型、社会关系和宗教信仰等主观因素。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的人来说影响程度不同,因此,他们出现了不同的经济、社交和文化适应状况^[32]。

关于影响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障碍,除了一般性的影响因素外,学者们更关注语言差异和支持系统的缺失。阿不都艾尼认为北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社会政策和法律支持体系缺失、社会舆论支持体系的缺失以及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微观层面的服务体系的缺失^[36]。高艳华经过对上海新疆穆斯林流动人口调查,认为社会支持的缺失是城市适应困难的根本原因,这种缺失既包括以初级群体为主体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的缺失,也包括以社会和政府为主体的正式社会支持的缺失^[42]。帕提古丽认为语言差异、社会关系、生活习俗、城市制度的缺失、族际交往与族际关系、与本地人的关系、误解与互助等因素都会对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城市文化适应产生影响^[35]。阿布都外力·依米提、胡宏伟认为语言不通和生活习惯是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不适应的主要障碍^[43]。

四、推进穆斯林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对策

如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研究最终目标。刘传江、周玲提出,农民工需要尽快融入城市社区,积极构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以弥补其离开原有农村社区带来的社会资本的损失^[44]。时立荣提出,建立具有服务功能的开放型社区,提供正式的社会服务,促进社区“新移民”的社会化,移民在社会化过程中超越户籍这一外在屏障,融入城市的生活方式中^[45]。

根据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现状及影响因素,不同研究者也相应提出了不同的对策建议。陈晓毅提出要积极支持“拉面经济”,发挥伊斯兰教协会的作用,解决流动穆斯林医保、社保、子女教育等

问题,宣传民族宗教政策等^[26]。高翔、鱼腾飞等针对目前流动穆斯林适应的主要关键障碍性因素,提出一方面应从改善流动穆斯林的经济条件入手,大力发展特色民族经济,努力提高居民生活状况,从而使其顺利适应城市社会生活;另一方面要强化他们的“自我认同”和“城市归属感”,以便其更好地为城市发展作贡献^[41]。李晓雨、白友涛认为不同城市的管理者要针对他们在社会适应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东部地区要更多地关注城市传统回族社区变化后流动穆斯林的基本生活问题,而西部地区则要考虑如何增强外来穆斯林对本城市的认同和归属^[30]。季芳桐、邹珊珊认为,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在公共设施、服务等方面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或安排,对于清真餐饮饭店,若是小的,则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若是已经上规模的,则尽量不去干预,实行“无为而治”;西北穆斯林都是少数民族,提高他们及其子女的文化程度对于流动穆斯林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相当的影响;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应积极出面协调、解决流动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各级政府在城市规划时,应该考虑流动穆斯林的因素,应该逐渐地或扩大或新增这方面的设置^[46]。任红针对穆斯林流动人口宗教生活的不适应问题,提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转变政府对城市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管理思路 and 模式,将政府宗教工作的外在引导转移到少数民族宗教内部的自我调节上,进而形成少数民族对城市化的良性适应机制。要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的宗教管理机制;尽快出台涉及流动人口宗教活动规范管理的法律法规;坚决制止非法宗教活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47]。

关于如何促进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帕提古丽提出政府职能部门应对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要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因势利导积极引导他们适应当前社会,充分发挥他们对社会经济发展、内地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作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应该充分地发挥主观作用,努力地协调自身民族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适应,为家乡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做出贡献^[35]。阿不都艾尼认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适应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因此要加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方面的社会支持,包括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城市民族工作支持、社区支持网络、新疆在京少数民族的族群关系网络支持^[36]。徐平、于泷认为,引导和帮助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积极融入城市社区,是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和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政府、社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自身都要发挥各自的作用,促进其社会融入,其中经济融入是基础,制度融入是跨越,文化融入则是关键^[37]。

五、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在数量上与有些少数民族相比,人数比较少,但由于其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与所在城市差异较大,并且有的民族如维吾尔族还存在语言障碍,因此其融入城市面临的困难更多。目前学界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分析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状况,探讨解决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基本思路,讨论了消除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体制障碍与结构性因素的必要性,强调要增加社会支持,促进穆斯林流动人口尽快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但是,与全国流动人口融入问题研究比较,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深度、广度上,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第一,研究方法单一。许多成果依靠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多,而深入的访谈、参与观察和追踪调查不足,能够深入穆斯林流动人口中进行交心,了解他们的生活、从业困难,获取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的成果更少。问卷调查可以反映穆斯林流动人口融入社会基本概貌,但其弊端是反映问题不深刻,群体中的特殊性难以体现出来。

第二,一般性的研究多,对具体问题研究少。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可以借鉴全国流动人口融入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但是穆斯林流动人口有其特殊性,其要融入当地社会比一般流动人口甚至其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更大的问题,即文化与

心理的适应与融入难度大。有必要将其融入状况和特点做详细研究,寻找出哪些方面适应或融入社会,哪些方面存在不融入情况,并分析其原因,这样提出的对策才有针对性。

第三,对穆斯林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拉面饮食、烧烤等特征明显群体调查研究多,而对于从业不够集中、特征不明显的流动人口如建筑工地农民工、生产企业工人等,由于其分散性,不便于调查,因此对其适应、融入情况研究较少。

第四,对回族研究多,对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研究相对不足。这可能是受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语言与心理交流沟通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五,定性研究多。大多数研究主要通过定性方法展开对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探讨,缺乏融入程度的量化研究,缺乏对融入影响因素的全面、深入的分析。同时研究仍然停留在问题分析的层面,尚未深入到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践层面,融入策略与实践行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从事不同行业、不同民族穆斯林都要进行研究,尤其是要发挥本民族研究者的优势,推动对新疆穆斯林民族调查与研究。同时,在研究中,要逐步构建穆斯林流动人口融入程度指标体系。目前对全国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学者们建立了研究的维度和指标体系,但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别是穆斯林流动人口指标体系还没有提出,可以借鉴国际上和国内学界有关指标,但也要体现出该体系的特点。同时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以便更深入、更全面地开展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3[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3.
- [2] 李景治, 熊光清. 中国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6(6).
- [3] 嘎日达, 黄匡时.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2).
- [4] ESFP. 2007. Further Information: Social Inclusion [EB/OL]. 2007—2013 European Structural Funds Program, <http://www.c9cp.Coquk/03-info-social-inclusion.html>.
- [5] Taylor M. Communities in Partnership: Developing A Strategic Voice[J].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V01. 5(2), 2006. pp. 269—279.
- [6] 任远, 鄢民乐.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J]. 人口研究, 2006(3).
- [7] 马西恒, 童星. 敦睦他者: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J]. 学海, 2008(2).
- [8] 张广济. 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关系的社会学解读[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2010(3).
- [9] 刘建娥. 中国乡—城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5.
- [10]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 2009(1).
- [11] 苏杨, 肖周燕, 尹德挺. 中国流动人口管理报告[M].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0: 156.
- [12] 风笑天. “落地生根”? ——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J]. 社会学研究, 2004(5).
- [13] 杨黎源. 外来人群社会融合进程中的八大问题探讨——基于对宁波市1053位居民社会调查的分析[J]. 宁波大学学报, 2007(6).
- [14] 张文宏, 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

- 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8(5).
- [15] 杨菊华.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0(2).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 2009(1).
- [16]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2[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82.
- [17] 李林凤. 从“候鸟”到“留鸟”——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 贵州民族研究 2011(1).
- [18] 李伟梁. 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0(2).
- [19] 马旭.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20] 任霞. 大城市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以上海市为例[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21] 张红. 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的适应与发展研究——以烟台市朝鲜族为例[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 [22] 高向东, 余运江, 黄祖宏.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基于民族因素与制度因素比较[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2(2).
- [23] 高翔, 宋相奎. 银川市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城市适应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6).
- [24] 汪永臻. 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经济融入研究——以甘肃省兰州市为视阈[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2(2).
- [25] 张继焦. 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93-279.
- [26] 陈晓毅. 都市流动穆斯林文化适应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基于问卷调查的广州个案实证研究[J]. 青海民族研究 2010(3).
- [27] 高翔, 程慧波, 鱼腾飞.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性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1).
- [28] 高翔, 张燕, 鱼腾飞, 宋相奎. 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实证研究——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J]. 人口与经济, 2011(2).
- [29] 张燕.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实证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30] 李晓雨, 白友涛. 我国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问题研究——以南京和西安为例[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9(1).
- [31] 白友涛, 尤佳, 季芳桐, 等. 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
- [32] 杨殷迪. 城市少数民族新移民社会融入问题探析——以广州回族为例[J]. 社科纵横 2011(3).
- [33] 龚坚. 外来穆斯林的城市适应状况——来自厦门市外来少数民族城市适应的调查报告[J]. 青海民族研究 2007(2).
- [34] 周传斌, 杨文笔.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宗教适应机制探讨——以中国都市回族伊斯兰教为例[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8(2).
- [35] 帕提古丽. 兰州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D]. 兰州: 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36] 阿不都艾尼. 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调查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 [37] 徐平, 于泷. 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和融入[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6).
- [38] 江立华. 社会排斥与农民工地位的边缘化[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6(6).
- [39] 丁宪浩. 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J]. 财经科学 2006(10).
- [40] 刘大兰. 影响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的障碍探析[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8(3).
- [41] 高翔, 鱼腾飞, 宋相奎, 程慧波, 张燕. 结构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分析——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J]. 西北人口 2011(4).
- [42] 高艳华. 在沪新疆少数民族的城市适应问题及其社会支持路径选择——普陀寺若干个案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43]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 胡宏伟.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特点、存在问题及对策——基于乌鲁木齐市和西安市的调查[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1).
- [44] 刘传江, 周玲.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 人口研究, 2004(9).
- [45] 时立荣. 透过社区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 新视野, 2005(4).
- [46] 季芳桐, 邹姗姗. 城市化进程中的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流动穆斯林城市管理研究[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08(2).
- [47] 任红. 流动人口宗教活动规范管理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J]. 新疆社科论坛 2011(6).

(责任编辑 马 旭)